

新世纪中印学者的跨文化对话

——印度学者访谈录

□ 尹锡南

1. “为什么印度应该有悲剧？”

——印度学者 D. S. 米什拉访谈录 1

尹锡南(下简称尹):先生您好!请问,您怎么评价拉什迪和奈保尔等后殖民作家的印度书写?

米什拉(Daya Shankar Mishra,印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英语系主任,下简称米):在我看来,奈保尔等人只是浮光掠影地描写印度,非常肤浅。他们在印度的时间非常短暂,无法对印度进行深入了解,对印度现状及其变化不甚了了。更重要的是,他们作品的阅读对象是西方人,他们必须不同程度地迎合西方,如奈保尔使用“黑暗地带”或“受伤的文明”来形容印度便是此意。多年前,拉什迪来过我校,我曾当面问他,你为何不写一本关于英国或美国的小说?他无言以答。我知道,他只要照我说的去做,西方人就会对他说:回你的印度去!我认为,拉什迪等人是在推销印度,这是一种文化上的特殊的殖民主义。

尹:先生,让我们换个话题吧。当今一些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提倡汉语批评,即以中国文论为工具评价西方文学,扭转西方话语独霸天下的局面。昨天,我在你们的图书馆看到一本题为 *East West Poetics at Work* 的论文集。其中一篇文章说,印度学者必须重建一种文论标准,以利西方读者以一种合理的方式来理解印度文学。这说明,中印

学者想到了一块儿。

米:我认为,每一文学都与其文化紧密相联,乃是其文化的独特产物。希腊文化接受死亡概念,但印度文化并非如此。再生(Samasara)是我们最重要的文化概念。亚里士多德等推崇悲剧,认为悲剧最美。奇怪的是西方认为印度缺少悲剧。这是用他们西方的文论标准来衡量我们的文学。西方还认为,印度文论缺少体系,而他们不乏体系。我在美国和加拿大时曾质问西方学者:究竟为什么印度应该有悲剧?西方文学为什么没有印度的艳情味(srngara)?印度文论为什么必须拥有你们西方意义上的体系?他们无言以对。如果以印度文论标准来衡量,西方文学没有味(rasa)。

中国学者提倡以中国文论为工具来评价西方文学,这是对的。问题是,中国古代文论必须进行自身的现代转化。以印度为例。我们的庄严论、味论、韵论等必须先运用于印度,确认其合理度及可行性。即使在过去,味论等也从来没有用来评价一部完整的印度古代作品。梵语诗学的六个流派没有一派用来评价印度两大史诗或其他任何一不完整的作品。因此,我们必须先将其运用于现代文学作品的评价。

的确,照西方标准看,他们的文论不乏体系,印度和中国则没有。再加上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强势,西方文论风行当今世界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你们的学者提倡汉语批评,这也是我们印度学者正在做的事情。我们中印学者如果将自己的文论成功地运用于西方文学批评之中,那么,我们可以自豪地说,从此我们在文化意义上是独立了。

尹:先生,聆听您的高见,使我非常高兴。您的观点,对于中国学者来说一定具有启发意义。

米:你如觉得某一观点可用,可以采用之。学习印度文论也好,学习中国文论也好,重要的是将其运用于文本批评之中。理论如不运用则无意义。

尹:希望先生能到中国去,与中国学者进行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您的观点会使中国学者受益颇多。

米:你也知道,由于各种复杂原因,我们还没有完全走到一起来。如果中印

学者走到一起来,我们将改变世界文论的格局。

尹:我相信这一点,谢谢先生。

2005年1月20日于印度古吉拉特

2. “我们必须有一个比较文学印度学派”

——印度学者 D. S. 米什拉访谈录 2

尹:先生,今天我想请教另外几个问题。今年8月19日,我访问了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阿米亚·德夫先生。(注:1956年成立的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是印度第一个比较文学系。)比较文学印度学派是我们的谈话主题之一,您对这一学派有哪些看法?

米:我们必须有一个比较文学印度学派。它虽然诞生在印度,是地道的印度式学派,但又具有普适性的一面。它的方法可以运用在东西方文学的比较上。印度比较文学必须努力发现两种文学之间的相似性,正是这种相似性使人类感情得以增长繁衍。

尹:比较文学印度学派的特征是什么?

米:它比较人类的内部洞见。它的目的是发现文学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社会。

尹:按照某些学者的说法,印度比较文学的目标是通过文学比较以联合不同语言区域的印度人民。您是否这样认为?

米:印度是一个存在多样性的大国,我们只有通过比较才能发现那些使印度人民和谐相处的东西。但是我不认为印度比较文学仅仅比较印度区域文学。因此,印度马拉提语文学和印地语文学的比较不是地道的比较文学,但是这种比较却是眼下发现印度性的一种必要手段。因为这毕竟是印度。

尹:那就是说,您不同意阿米亚·德夫和 S. K. 达斯先生关于“比较印度文学(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是地道的比较文学的主张。阿米亚·德夫先生认为,印度学派是继法国、美国、苏俄学派之后的第四个比较文学学派,而中国学派是第五个这样的学派。阿米亚·德夫在他于1984年出版的《印度比较文学的观念》中与西方学者艾金伯勒“比较不是理由”(comparaison n'est pas raison)的论断针锋相对:“比较正是理由”(comparaison c'est vrai raison)。

米:我只在一定程度上同意他们的观点。正如我刚才所言,一种印度语言文学与另一种印度语言文学的比较是发现印度性。但是印度比较文学的真正目的不是这样,它必须在跨文化基础上比较印度与其他国家的文学。眼下,许多印度学者正在做的就是这种比较研究。

尹:看来,在印度,注重区域文学比较的“比较印度文学”能与跨文化基础上的比较文学并存。

米:是的。

尹:先生,一些印度学者认为,西方诗学有其局限性,而梵语诗学具有普遍运用价值。梵语诗学可以用来评价西方文学。但问题是,西方学者会反问:“为什么梵语诗学具有普适性而我们西方诗学有局限,因此不能用来评价东方文学?”

米: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这样设问。但印度诗学能随着时间不断进行修正。如果你翻阅印度诗学发展史,你会发现,许多学者按照时代的要求已经对诗学理论进行了调整。印度诗学并不那么保守封闭。它有随着时代需要而修正和发展自身的潜力。

尹:因此,今天我们仍可运用味论和韵论来分析评价东西方文学?

米:是的。

尹:先生,您曾教授我《诗探》(*Kavyamimamsa*)第3章。那位独特的诗原人诞生后对他母亲即印度语言和智慧女神萨拉斯瓦蒂说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这个世界就是语言,它以意义的形式而展开。”这句话紧扣印度语言哲学。愿闻其详。

米:印度传统文化深信语言的自主性。《犁俱吠陀》中说最原始的真实乃是语言(Vach)。语言创造世界(Visva)。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把语言叫做“Chandasa”(意义)。按照印度语法学观点,来自世界的声音意味着运动(Gati)而非仅仅声音而已。当我们说通过语言了解事物万千时,这是真谛。

尹:先生,上次在加尔各答访问阿米亚·德夫先生时,他告诉我,某些印度学者对与中国知识界进行学术合作兴趣不是很浓,中国方面也是这样。为什么?

米:过去十年里印度已开始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并且我以为越来越多的优秀的中国文学翻译本应该在印度求之即得。中国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努力,使中国文学不只在德里和加尔各答,而在全印都可传播。印度方面也必须调整自己的文化策略。我相信,随着时间推移,中印文化交往会达到一个理想的阶段。

尹:我同意先生的观点。已经到了必须有越来越多中印文化交流的时候了!

米:另外,我认为现今中印学人必须按照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重新界定比较文学。印度比较文学或中国比较文学不应是欧洲比较文学的翻版。同时,我们也不要使中印比较文学变成法国学派或美国学派的反话语(counter-discourse)。我们必须使比较文学成为理解人类文化的一个手段。如此,比较文学便具有其积极意义且将拥有灿烂的未来。

尹:先生,您已经读过我们四川大学的英文杂志《比较文学:东方与西方》,您是否想给该刊主编、我的导师曹顺庆教授说几句话?

米:我已经浏览了曹教授寄给我的所有刊物。我认为,曹教授正在从事的是

一项非常具有开创性的艰苦工作。请转告他,克服一切困难继续这项事业。因为,这是当前世界比较文学的要求。真正的比较文学既要保持人类意识,又要兼顾中印社会的独特个案。请转达我对曹教授的敬意!

尹:谢谢先生,我一定转达。

2005年10月2日于印度古吉拉特

3. “印度的必须成为理论”

——印度学者 K. 卡布尔访谈录

尹锡南(下简称尹):先生您好!自从来到印度,我发现一批印度学者不遗余力地提倡,用印度传统的文学理论来批评阐释西方和印度的文学作品。我已经看过您的两本书,即《文学理论:印度的概念框架》和《语言、语法及文学:一种印度视角》,您在书中就有类似见解。今天能否请您再谈谈这一问题。

卡布尔(Kapil Kapoor,印度尼赫鲁大学前任校长,英语系教授,下简称卡):你知道,印度受到西方影响已经多年,印度教育体制已被西方取代,印度传统思想文化不受重视。印度人在心智上已成为西方的附庸。西方的成为理论,而印度的东西则变成论据。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印度已经停止思考,我们在思想观念上依赖于西方,而失去了独立性。三十年前,我决定教授梵语诗学理论、哲学,提倡运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我认为,印度的必须成为理论,让西方的东西成为论据。如果我们能够独立地运用自己的诗学理论发言,而不再一味借重西方话语,那我的初衷便实现了。

尹:先生,和您的做法相似,目前在中国也有一些中国学者提倡以中国文论为工具,阐释分析西方文学作品,但这一设想遭到了另一些学者的质疑或反对。

卡:印度也是如此。当初我提倡用印度传统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时,也

曾遭到猛烈抨击。现在,许多印度学者开始走上了这条道路。他们开始在英语系教授梵语诗学,并用印度诗学理论来评价西方文学作品。

尹:先生知道。世界比较文学已经走过了法国学派、美国学派两个重要阶段。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建设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它以跨文明的文学比较为其基本特征。照我看来,中国学派亦可发展而为“中印学派”。中印同属第三世界,在文化发展和基本国情方面也许多相似点。况且,虽然印度学者建立比较文学学派的呼声不是很高,但你们在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的某些方面已经走到了中国同行的前面。我们联合起来不仅对彼此有益,而且还能对世界比较文学格局产生有力冲击。待到“中印学派”发展成熟,我们可以将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的比较文学界沟通之,酝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东方学派”,这一学派的最基本特征仍然是跨文明研究。

卡:这个设想很有意思。东方地区的文学本质上有别于西方文学。东西方文化性质的差异制约着文学的发展。印度、中国、日本、韩国、阿拉伯世界在文化上有许多相似点。西方文学虽然在某些方面与东方文学相通约,但其差异性明显存在。在印度,我们的文化与“法”(Dharma)息息相关,而西方文化则与“原罪”等概念密切相联。我们必须正视东西方文化性质差异。

尹:您的观点非常有意义,我将把它介绍给中国学者。谢谢先生!

2005年3月14日于印度新德里

4. “梵语诗学具有普遍适用价值”

——印度学者 A.I. 塔戈尔教授访谈录

尹锡南(下简称尹):先生,两个月前,我访问了贝拿勒斯印度教大学的 R.P.德维威迪教授。我们就梵语诗学进行了一些对话。看得出,德维威迪先生推崇梵语诗学体系中的庄严论。他认为庄严即为诗歌灵魂,而韵则有缺陷,因为其表述很含糊。您怎么看待他的观点?

A.I. 塔戈尔(Ajit I. Thakur,印度沙达尔·帕特尔大学梵语系主任,下简称塔):德维威迪是庄严派大师,他认为庄严即诗歌灵魂。我则认为韵是诗歌灵魂。

尹:先生,我曾请教尼赫鲁大学前任校长 K.卡布尔先生和贵校英语研究生系主任 D.S.米什拉先生,他们都强调印度文学理论应该用来评价印度和西方的文学作品。您对此作何评价?

塔:他们是对的。我们的梵语诗学具有普遍适用价值。我们的心智建立在自己的传统文化上。为什么不能运用我们自己的诗学理论于批评实践呢?

尹:先生,您自己有否这方面的实践?

塔:当然有。如1990年,我曾运用味论和韵论去评价印度作家 R.沙哈的诗歌《沉默的喧闹》。今后,我还想用梵语诗学理论去评价你们的中国诗歌。

尹:先生,这里有另外一个问题。部分印度学者说,西方诗学不具有普遍运用价值,因此不能用来评价印度文学。也许,西方学者会问,为什么只有你们梵语诗学能够普遍适用于西方文学的阐释分析?

塔:每一诗学理论都有两个方面。其一,每一诗学与其文化紧密相关,其中一些理论只有一定的适用范围;其二,每一诗学都有普遍适用的成分。西方诗学强调悲剧。因此,我们的某些诗学概念不能用在希腊悲剧的批评分析上。

尹:某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印戏剧中没有悲剧。您怎么看待这一说法?

塔:那些西方学者是以他们的理论标准来评判我们的文学。事实上,印度文学中存在着大悲剧。我们的大史诗《摩诃婆罗多》是一部伟大的史诗悲剧或曰悲剧史诗。《罗摩衍那》的结局非常荒诞、令人绝望,它也可视为一部悲剧。

尹:可以说它们是独特的印度式悲剧。按照印度学者的观点,《摩诃婆罗多》的主味是“平静味”,而《罗摩衍那》的主味则是“悲悯味”。

塔:西方学者不应该问我们为什么没有他们那样的悲剧。我们的作家不想创作西方式的悲剧。

尹:谢谢先生的解说。欢迎您到中国进行学术访问。

2005年10月4日于印度

5. “比较印度文学是真正的比较文学”

——印度学者阿米亚·德夫访谈录

尹锡南(下简称尹):先生,您好!我在印度第二个比较文学系即南古吉拉特大学比较文学系访问时,系主任德赛先生(Asvin Desai)告诉我,他认可国际比较文学和国内比较文学。能否请您告诉我您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

阿米亚·德夫(Amiya Dev,印度加尔各答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退休教授,前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下简称阿):我没有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很难对它进行定义。不过,我认为,韦勒克等人已经老了,他们关于比较文学的定义是有问题的。

尹:我正在撰写一篇与印度比较文学发展有关的文章。查阅资料时我经常遇到一个关键词“comparative Indian literature”,您和达斯先生(Sisir Kumar Das)等是这一提法的始创者。能否请您就“比较印度文学”这一关键概念谈谈?

阿:“比较印度文学”是真正的比较文学。它对于研究互有关联的众多印度区域文学是一正确方式,因为印度次大陆每一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学。我们没有一种纯净的印度文化,它由许多种印度文化构成。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印度文学”是比较文学印度学派的重要特征之一。

尹:说到学派,我们中国学者也在倡导建立比较文学的中国学派,这是比较文学走向跨文明研究即走向第三阶段的必然结果。

阿:但是我要告诉您,比较文学的第一个学派是法国学派,其次是美国学派,再次是苏联东欧学派,再次是我们的印度学派,这在我1984年出版的书《印度比较文学观念》中已经提出过。中国学派应该是第五个这样的学派。

尹:先生的观点有新意。我想告诉您,目前中国学者正在倡导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从而建立真正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因为法国学派也好,美国学派也好,都只是西方文明内部的比较研究。我们应该将东西方跨文明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上议事日程。今年3月14日,我在与印度尼赫鲁大学卡布尔先生交谈时提出,鉴于中印均属东方文明古国,我们有这么多年比较文学研究实绩且有一些思路的交汇,因此完全可以酝酿建立一个比较文学的“中印学派”,进而建立一个地域更为广大的“东方学派”。单独的比较文学“中国学派”也好,“印度学派”也好,抗衡西方的强势话语是力不从心的。总之,合则双赢。

阿:在这个全球化时代,西方或曰欧洲中心主义依然存在。但欧洲中心主义并不是唯一的敌人。我们还有一个敌人即对于自身独特性的坚持。我很欣赏你们北京大学的乐黛云先生关于文化相对主义的观点。我们不要本质主义。你们中国学派是以西方主义去理解东方主义,这大可不必。

尹:关于中国学派的问题,我很愿意与先生继续进行对话。前几个月,我读到了一本书《运作中的东西诗学》,里面收录了许多印度学者利用梵语诗学进行文学批评的文章。我将之称为“梵语批评”,以与我们中国学者提倡的“汉语批评”相对应。您对这些印度学者以这种方式来评价西方文学有何看法?

阿:1994年,我在加拿大开会,中国的乐黛云在会上发言说,中印诗学都有悠久的传统。但我有另外的想法。我不认为梵语诗学体系是固定不变而超越历史的。因为印度已经接受西方诗学影响多年。再说,虽然印度知识体系是梵语传统,但我们有几个主要语言系统。因此我们有达罗毗荼诗学、梵语诗学,还夹杂了一些波斯诗学和阿拉伯诗学。没有纯粹的印度诗学,只有多种复数的印度诗学体系。当然主要的还是梵语诗学。您前边提到的那本书的主编是我的朋友,我

曾经为此书写过评论。这本书有问题,为什么您偏用梵语诗学为标准来评价?还有,如果您用味论来点评莎士比亚等西方作家及作品,这没有害处。问题是理解莎士比亚,您得回到历史深处。

尹:非常感谢先生接受我的访谈。欢迎您再次访问中国!

2005年8月19日于印度加尔各答

6. “比较文学没有固定的定义”

——印度学者 S. C. 达斯古普塔访谈录

尹锡南(下简称尹):达斯古普塔教授,早上好!能否请你告诉我贵系今年招生情况及师资力量。

达斯古普塔(Subha Chakrabati Dasgupta,女,印度贾达瓦普尔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下简称达):今年我系招收了45人攻读学士学位,60人攻读硕士学位,25人攻读博士学位。我系目前有12位教师,其中女教师5人。教师中多半具有博士学位。

尹:能否介绍一下贵系的教学与研究内容?

达:我本人主要研究比较文学理论,接受理论和叙事学。我系主要教学以下课程,如印度文学、梵语诗学、民间文学、佛教及耆那教文本,还有关于不同国家文学的“区域研究”,包括孟加拉文学、拉美文学、加拿大文学、日本文学、中国文学等。我们也教鲁迅和李白,学生们有兴趣学习。

尹:贵系有否教师研究中国文学或进行中印文学比较?

达:目前我正在主持高级研究中心的工作。我们计划将中日印古代文学研究纳入视野,以弥补我们以前的不足。

尹:根据我的了解,您曾经对泰戈尔与歌德进行过比较研究。那么,这二人关于世界文学的观念有何异同,愿闻其详。

达:歌德与泰戈尔曾经先后提出过“世界文学”的主张。歌德的“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观念还是非常有局限性的,与政治有一定的关联,且有西方中心主义的残余;而泰戈尔的“世界文学”(VisvaSahitya)理念是非常独特的,他的眼光异乎寻常。他以不同方式阐释人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问题。不过,他们的理论产生于不同的时代地域,具有各自的价值。

尹:遗憾的是,阿米亚·德夫先生未给我一个关于比较文学的印度定义。您能否就比较文学作一定义?

达:比较文学没有固定的定义,因为比较文学研究随时随地都在变化中进行。研究不同文化场域中的文学或曰跨文化的文学仿佛一种对不同文化进行研究清理的复杂程序。

尹:您能否就“比较印度文学”这一概念作一简单说明?

达:我认为,“印度比较文学(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India)”这一概念比起“比较印度文学”要好些。前者既研究比较印度区域文学,又注重印度与世界文学的比较研究,而后者只注意印度区域文学的比较,有其局限性。我赞成“印度的比较文学”的概念而非“比较印度文学”。

尹:感谢您接受我的访谈,欢迎访问中国及中国四川大学比较文学系。

2005年8月19日于印度加尔各答

7. “可惜我不能阅读《庄子》”

——印度学者 S.巴帕特访谈录

尹锡南(下简称尹):巴帕特教授,您好!您能否谈谈印度与西方哲学理念的区别?

巴帕特(Shailaja Bapat, 女, 印度浦那大学梵语系主任, 下简称巴): 印度与西方哲学体系不同, 我们有正统的研究, 如吠檀多、数论、弥曼差哲学等, 西方是非正统的体系。印度哲学根源在吠陀哲学, 它有复杂的体系。印度哲学强调人及其解脱问题, 而西方哲学重外部世界的本质探究。印度不仅关注世界, 也关怀人的终极问题, 如再生问题等。我曾进行过印西哲学思想比较。我钻研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也读过维特根斯坦, 他说语言是一场游戏。在印度哲学里, 正理论也关注语言与意义的作用。它们可以比较。另外, 梵语诗学深受印度哲学影响。

尹: 说到梵语诗学, 阿米亚·德夫先生认为它只是印度诗学中的一支, 他对印度学者利用梵语诗学批评东西方文学持不置可否的态度。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巴: 味论、韵论当然可以用来评价文学作品。不过, 德夫先生的观点有些道理, 就文学而言, 我们有梵语文学、巴利语文学, 后来还有马拉提文学、孟加拉文学等。印度诗学有分支也是可以理解的。

尹: 巴帕特教授, 您正在努力跟我们学习中文。那么您的初衷是什么?

巴: 你知道, 有些梵文佛经在印度难以寻觅, 只保存在中文和藏文佛经里。我想学习中文, 阅读中文佛经, 然后将那些在印度失传的佛经从中文再译为梵语或英语。那些中文佛经是中国文化最宝贵的部分, 希望你们中国学者珍惜并好好研究。我也希望有中国学者能与我合作, 让我实现初衷。

尹: 巴帕特教授, 我认为, 不仅中国的文学、文论可以跟印度文学文论进行比较, 中国的哲学思想也可以与印度的进行比较。以文论为例, 你们有味论, 我们有“滋味”说; 你们有韵论, 我们有“神韵”说。再以哲学思想为例。在中国道家哲学著作《庄子》里, 庄子为死去的妻子鼓盆而歌, 因为他妻子来彼大荒, 归彼大荒。这个寓言蕴涵着丰富的中国哲学文化信息。想起这个哲学寓言, 我就马上会想起印度人的生死哲学观。

巴: 你说的中国哲学寓言非常有趣。可惜我不能阅读《庄子》, 不然多好。在我们印度人看来, 尽管某个人已经谢世, 但是他仍然活在世上。他将在这个世界再生。我们将之称为再生。如果你有机会再来浦那大学, 我们便可以合作进行中印哲学或文论的比较研究。

尹: 我也希望如此。同时, 我希望您向校方呼吁一下, 建立一个中文系, 这样对于您的中国佛经研究肯定好处多多。如果此一梦想果然成真, 那么请一定培养一些学习并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古代文论的人才, 这会有利于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国古代文学文论是中国的瑰宝, 正如梵语文学诗学是印度文化极品一样。当今少有印度学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文论, 而中国则有季羨林和黄宝生先生等研究你们的古代文学和梵语诗学。

巴: 好的。我们浦那大学正在筹划建立中文系, 但这往往是政治家的事情, 说不定哪天就会变卦或停止。但我们将为此努力。

尹: 谢谢教授! 欢迎您访问中国!

2005年9月16日于印度浦那大学